

竺建新◎著

多维文化视域下的  
现当代作家研究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多维文化视域下的 现当代作家研究

竺建新◎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多维文化视域下的现当代作家研究 / 竺建新著. —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308-17006-2

I. ①多… II. ①竺… III. 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  
文学研究 IV. ①I206.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36930 号

## 多维文化视域下的现当代作家研究

竺建新 著

策划编辑 宋旭华

责任编辑 杨利军

文字编辑 马一萍 闻晓红

责任校对 丁沛岚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中大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日报报业集团盛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188 千

版 印 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7006-2

定 价 43.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bstmall.com>

# 目 录

<b>第一章 吴越文化与汪曾祺小说创作 .....</b>	<b>1</b>
第一节 吴越文化与汪曾祺小说的诗性意蕴 .....	4
第二节 吴越文化与汪曾祺小说的自由意识 .....	21
第三节 吴越文化与汪曾祺小说的诗化特征 .....	33
<b>第二章 南宋文化与杭州籍现代作家 .....</b>	<b>48</b>
第一节 南宋文化与南宋文学 .....	48
第二节 南宋文化与杭州籍现代作家 .....	61
第三节 南宋文化与郁达夫的文学创作 .....	70
<b>第三章 浙东文化与白马湖作家群 .....</b>	<b>83</b>
第一节 山与水:浙东文化刚柔并济的地域特征 .....	84
第二节 浙东文化与白马湖作家群的审美追求 .....	87
第三节 浙东文化与白马湖作家群的文学创作 .....	100

<b>第四章 佛教文化与浙籍现代作家 .....</b>	104
第一节 浙籍现代作家的近佛之缘.....	104
第二节 佛教文化与浙籍现代作家的审美追求.....	112
第三节 佛教文化与浙籍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	127
<b>第五章 浙籍现代作家个案研究 .....</b>	139
第一节 佛教文化与鲁迅的“性恶书写”.....	139
第二节 郁达夫、戴望舒和施蛰存的佛道文化内蕴 .....	152
第三节 浙籍现代作家的生态文化内蕴.....	168
<b>第六章 底层文化与当代作家研究 .....</b>	179
第一节 21世纪农民工题材的苦难叙事 .....	179
第二节 21世纪农民工题材的“失范书写” .....	187
第三节 方格子底层文学论.....	199
<b>参考文献 .....</b>	219
<b>索引 .....</b>	226
<b>后记 .....</b>	229

## 第一章

# 吴越文化与汪曾祺小说创作

文化是包含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母系统。学者庞朴认为这个系统共分为三层：“它的外层便是物质的部分——不是任何未经人力作用的自然物，而是‘第二自然’（马克思语），或对象化了的劳动。文化的中层，则包括隐藏在外层物质里的人的思想、感情和意志，如机器的原理、雕像的意蕴之类；和不曾或不需体现为外层物质的人的精神产品，如科学猜想、数学构造、社会理论、宗教神话之类；以及人类精神产品之非物质形式的对象化，如教育制度、政治组织之类。文化的里层或深层，主要是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等。”<sup>①</sup>其中，文化的深层内涵是影响作家审美理念和文学创作的关键因子。

考察文化和作家的关系时，首先应该考虑地域文化。依照庞朴的观点，地域文化（regional culture，或称“区域文化”）对该区域人们的影响也可分三个层次：一是对人们的生活方式等习惯的影响，这是地域

<sup>①</sup> 庞朴：《文化结构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

文化的表层内容。二是对人们的风俗和礼仪制度的影响,这是地域文化的中层内容。三是对心理结构和审美观念的影响,这是地域文化的深层内容。

地域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原型,一种区域性的文化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整体文化中,影响和制约人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的生成及其发展,影响着作家的文学审美风格。

所谓原型,瑞士心理学家荣格认为,原型(archetypes)是“最初的模式,所有与之类似的事物都摹仿这一模式”<sup>①</sup>。原型批评家弗莱赋予原型以文学的含义。他认为,有些常见的自然现象,如大海、森林等,在文学中反复出现,就不可能是“巧合”,相反,这种反复显示了自然界中的某种联系。关于大海的叙述可能就是一个原型模式。他指出,一种文化原型就是“一个象征,通常是一个意象,它常常在文学中出现,并可被辨认出作为一个人的整个文学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sup>②</sup>。这些意象能够呈现文化构成的全部细节,同时还将深深地刻印在人们的脑海里,潜移默化地制约着人的思想与言行。

所谓“集体无意识”,荣格认为:“并非由个人获得而是由遗传所保留下来的普遍性精神机能,即由遗传的脑结构所产生的内容。这些就是各种神话般的联想——那些不用历史的传说或迁移就能够 在每一个时代和地方重新发生的动机和意象。”<sup>③</sup>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特点,使得地域文化具有超强的继承性特征,并对人的思维、心理感悟等方式及审美追求产生深刻影响。

<sup>①</sup> [美]霍尔,等:《荣格心理学入门》,冯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第44页。

<sup>②</sup> [加拿大]弗莱:《批评的解剖》,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71页。

<sup>③</sup> [瑞士]荣格:《心理类型》,转引自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67页。

学者黄健认为：“从文化对人的影响来说，文化原型的影响最为深远。地域文化作为文化原型，无论是对整体文化生成而言，还是对个体成长而言，都具有一种‘无限强大’的超人力量。这种力量的直接显现，就是它的母文化影响功能。”<sup>①</sup>正是因为地域文化具有母文化影响功能，它便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深刻影响人们的性格特征和审美理念。

关于地域文化对当地居民思想性格的影响，不少思想家有过著名的论断。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认为：“南方感受性敏锐……在北方的国家，人们的体格健康魁伟，但是迟笨……你将在北方气候之下看到邪恶少、品德多、极诚恳而坦白的人民。当你走近南方国家的时候，你便将感到自己已完全离开了道德的边界；在那里，最强烈的情欲产生各种犯罪……在气候温暖的国家，你将看到风尚不定的人民，邪恶和品德也一样地无常。”<sup>②</sup>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也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它的心理是由它的境况所造成的，而它的境况归根到底是受它的生产力状况和它的生产关系制约的。”<sup>③</sup>

关于地域文化对文学的影响，不少学者、文学家也都颇为认同。美国学者赫姆林·加兰说：“显然，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涌现出来的魅力。”“今天在每种重大的正在发展着的文学中，地方色彩都是很浓郁的。”<sup>④</sup>苏联文学理论家巴赫金指出：“文学领域，更广一点说，文化（不能把文学与文化割裂）组成了文学作品和作品中的作者立场的必然语境，离开了这个语境既不能理解作品，也不能理解作品中被

<sup>①</sup> 黄健：《“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6页。

<sup>②</sup> [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30页。

<sup>③</sup> [俄]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曾葆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3年，第47页。

<sup>④</sup> [美]赫姆林：《破碎的偶像》，《美国作家论朋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85页。

反映的作者的内涵。作者对文学和文化不同现象的态度具有对话性质……”<sup>①</sup>中国近代大儒梁启超论及南北文学风格时同样指出地域文化对文学创作的深刻影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周社会之影响特甚焉。”<sup>②</sup>

综上，作为文化原型，地域文化不仅影响了人们的生活特点、思维方式和饮食习惯，更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性格、审美心理和艺术创作。因此，吴越文化作为古老的地域文化，已经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对汪曾祺的文学理念和文学创作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 第一节 吴越文化与汪曾祺小说的诗性意蕴

江南，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中，不仅仅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个文化概念。学者刘士林认为：“在江南文化中，还有一种最大限度地超越了儒家实用理性、代表着生命最高理想的审美自由精神。儒家最关心的是人在吃饱喝足以后的教化问题，如所谓的‘驱之向善’，而对于生命最终‘向何处去’，或者说心灵与精神的自由问题，基本上没有接触到。正是在这里，江南文化才超出‘讽诵之声不绝’的齐鲁文化，把中国文化

<sup>①</sup> 转引自吕六同编著：《20世纪世界小说理论经典》，北京：华夏出版社，1995年，第190页。

<sup>②</sup> 梁启超：《中国地理大论》，《饮冰室文集》第23卷第4册，转引自张万仪《鲁迅与吴越文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8期。

精神提升到一个新境界”<sup>①</sup>。江南文化这种超越功利的审美精神是对过于政治化的中国文明的一个有力反拨。因此，吴越文化<sup>②</sup>作为江南文化的主体，更具有诗性特质和审美品格。

“江南作为文化概念，原初是政治性的，后来主要是审美性的。”<sup>③</sup>应该说，吴越文化并非一开始就是审美性的，也有刚性向柔性转变的特点。众所周知，早期的吴越民族是个好武善战的民族。古书记载：“吴越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sup>④</sup>但学者董楚平认为“柔、细、雅，似乎可以称得上是七千年吴越文化的共同个性特征”<sup>⑤</sup>，并列举河姆渡出土的七千年前的象牙雕刻“鸟日同体”图精致、柔雅，甚至吴越兵器都是精致的艺术品作为佐证。而且，他认为汉代以后，吴越地区的民风也不再是“轻死易发”，柔、细、雅的气质特征就显得更为突出，冲淡平和的诗性文化构成了吴越文化的深层特征。

吴越文化性格发生嬗变的原因，就其自身而言，是吴越特殊的自然环境。吴越之地多水，自然风光十分秀丽。东晋书法家王献之说：“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随着农业文明的发展，吴越之地生产力提高，水患大大减少，从而吴越山川变得愈加秀丽，物产富饶、交通便利，成为鱼米之乡，并由此逐渐地形成吴越文化清新自然、缜密细腻、精致典雅等诗性文化的审美特征。从外部因素而言，中国历史上的三次北人南迁对吴越诗性文化的生成影响十分巨大。学者董楚平认为：“吴越文化的发展获得三次外部机遇：一是永嘉之乱；二是安史之乱；三是靖康之难。中华文明的

<sup>①</sup> 吴越文化可细分为吴文化和越文化。吴地处太湖流域，以苏南、杭嘉湖为主，吴文化多柔性特征；越地处绍（兴）宁（波）台（州）等地区，越文化多刚性特征。为行书方便，本书对吴文化和越文化没有作严格意义的区分，统称为吴越文化。

<sup>②</sup> 刘士林：《谈“江南诗性文化”》，《解放日报》2004年10月17日。

<sup>③</sup> 陈望衡：《江南文化的美学品格》，《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sup>④</sup> 班固：《汉书·地理志》（卷八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667页。

<sup>⑤</sup> 董楚平：《吴越文化概述》，《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

这三次劫难,却给吴越文化带来了加速发展的机会。先进的中原文化大规模涌入,南京与杭州一度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心。经过千余年的融合与发展,明清时期的吴越文化成为中国汉族文化中最先进的区域文化,吴越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文化的重心地区。”<sup>①</sup>北人南迁使文人学士也大批南下吴越之地,如王充、王羲之、谢灵运等,形成文人云集的景象。特别是魏晋时期,晋室南渡的同时,也带来了玄学思想。玄学崇尚“清谈”,这使原来吴越之地的“尚武”习俗受到很大冲击。于是,吴越尚文风气日盛。

学者刘士林认为,江南文化是一种诗性文化。<sup>②</sup> 其发生显著变化的标志是永嘉南渡,代表文献是《世说新语》和南朝乐府民歌。在《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嵇康和阮籍这样与众不同的文人形象。在这些士人的眼中,艺术的审美境界开始逐渐地超越政治权力的角逐而成为生活的主体。魏晋名士醉心艺术,实际上是他们精神个性自觉的一种外在流露,审美个体从名法礼教中逐步地获得解放。同时,民间的乐府民歌作为审美话语体系和表现方式,在民间诗意图流觞,蔚然成风。“江南情结”深入人心,江南文化懂得如何在生活中超越实用伦理的束缚,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体超功利的审美需求。从这一精神流变上来看,晚唐五代是江南诗性精神的成熟时期。吴越地处江南,经济上更是占优势地位,是江南中占主导地位的区域。显然,比之江南其他区域,吴越文化的诗性精神更臻成熟。

因此,相对于政治伦理功能比较突出的北方文化而言,吴越文化呈现一种飘逸、秀美婉约、精致典雅、超越实用功利的特征,更重主客体的和谐交融,更多几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审美气质。吴越之地“杏花

<sup>①</sup> 董楚平:《吴越文化的三次发展机遇》,《浙江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sup>②</sup> 刘士林:《江南与江南文化的界定及当代形态》,《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春雨”之自然环境特征,在审美的精神层面上,往往成为古代文人的精神原乡,使得他们产生超越凡尘超越世俗的生命感怀。吴越文化以其超功利的审美气质和诗性精神,激发了无数文人的想象空间和创作潜能,对文人的创作影响深远。从文化传承和文化心理的无意识积淀来说,富有诗性品格的吴越文化,总是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深深影响着生于彼长于彼的文人的文学创作。

吴越文化冲淡、平和、精致、典雅的诗性文化审美特征,使得吴越文人的思维和审美多是偏柔性的,超功利的。汪曾祺在吴越文化诗性精神的长期浸染下,其主体的诗意性就十分突出。超功利和追求生命意义的理想境界成为他的创作目标。追求心灵的自由是他的小说创作的生命形式,追求诗性精神也就成为他的小说创作的审美品格。

汪曾祺是个极具艺术个性的作家,在新时期的文学创作中可谓独树一帜。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中国文坛上,“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是当时的文学主流,文学作品大多带着伤感的情调,承载着较多的政治和社会伦理批判任务。而几乎同时,汪曾祺却以一篇风格清新俊逸的短篇小说《受戒》重新步入文坛。汪曾祺小说故事内蕴的“冲淡平和”和叙述风格的诗意化,在评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汪曾祺的作品让人们重新审视文学的审美功能,重新重视文学的美学意义。因此,有学者这样说:“真正使新时期小说步入新的历史门槛的,应该是手里擎着《受戒》的汪曾祺。”<sup>①</sup>

那么,汪曾祺为什么要规避政治,为我们构建一个充满诗意的原生态的乡土世界?笔者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是吴越文化的诗性精神影响了他,使他走向心灵世界,走向精神的“乌托邦”。芭芭拉·哈代指

---

<sup>①</sup> 马风:《汪曾祺与新时期小说》,《文艺评论》1995年第4期。

出：“人类的心理意识中，存在着叙事的动机。”<sup>①</sup>汪曾祺出生在江苏高邮的一个士大夫家庭，生长在吴越文化浓厚的地域范围内，从小就对吴越文化原生态的乡土世界十分熟悉。因此，从地域文化作为母文化的孕育因素和功能的角度上来说，吴越文化，特别是吴越文化的诗性精神意蕴，乃是汪曾祺创作吴越风俗小说的一个原始动机。

从汪曾祺小说创作的美学品格上来说，吴越文化的诗性精神是汪曾祺小说创作的自觉追求。要研究汪曾祺小说的诗性意蕴，我们不能忽视吴越文化的诗性精神及其对他的深刻影响。

## 一、吴越自然山水与汪曾祺小说的诗性情怀

秀丽的自然山水是吴越之地一个非常明显的自然景观特征。汪曾祺在他的小说中着力渲染吴越自然风光，以此抒发他的诗性情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越的自然山水，作为抒情的能指对象，成为汪曾祺通过小说创作抒发诗性情怀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维度。

马克思指出：“从理论领域来说，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一方面作为自然科学的对象，一方面作为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sup>②</sup>离开了自然这个“精神食粮”，人的精神也就成了无源之水。马克思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密不可分性，证明了实体自然和价值自然之间的联系。

在中国古典哲学范畴中，自然也是个重要的哲学概念。从老子到庄子，自然与人的关系，演化为天与人的关系，逐步成为中国哲学的核

<sup>①</sup> [美]芭芭拉·哈代：《关于小说的诗学》，转引自徐岱《小说叙事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页。

<sup>②</sup> [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心问题之一。道家创始人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sup>①</sup>针对老子的“自然”，胡适认为：“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只是自己如此。”<sup>②</sup>可见，老子“道法自然”的“道”就是“自然之道”，就是“自己而然”，即事物的本然。道家力图回归自然，不是回到自然本能生活，而是按自然赐予人的本性生活。永嘉南渡后，玄学思想开始在江南大地滋长，江南玄学与江南自然山水相结合。于是，本来形而上的自然与江南自然山水完美契合。文人以回归自然的外在方式，推崇顺应自然生命，追求本真的审美理念，“自然”成为文人为心灵提供终极关怀的一枚重要棋子。无论是西方哲人的自然观，还是我们本土先哲的自然观，都凸现了自然是人的精神活动的场所。自然成为人释放心灵的一个载体。人只有回归自然，才能走出主体性，靠近诗性本源。人们渴望自由时，往往以精神活动臆想乌托邦式的自由，往往以形而下的实体性自然来象征自由。形而下的实体性自然界只有作为人的自然（自由）心境的具象显现时，才能成为审美对象。所以，人们以自然美景为审美对象时，自然界实际上是对人们心灵的自由状态的折射。可见，走向自然意味着释放心灵的自由，意味着主体诗性情怀的宣泄。

相对中心区域的文化而言，吴越文化不以过分张扬伦理为目的，而是偏重于超功利的审美，以获得主客体交融的审美愉悦。学者刘士林认为：“如果说江南文化就像海德格尔讲的比任何‘存在’都要多出一点什么的‘此在’，那么就可以说，既不是因为在生活资料上的富裕，也不是因为在文化教育上更发达，而恰恰是因为它比中国其他区域文化多了一些超越实用性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审美创造与诗性气质，才使江南文化从中国文化地图中以‘遗世而独立’的方式凸现出来，成为一种‘受命不迁，生南国兮’的特殊人文地理景观。在这个意义上讲，

<sup>①</sup> 冯达甫：《老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50页。

<sup>②</sup>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46页。

诗性与审美当然就是它最本质的特征。”<sup>①</sup>吴越文化作为江南文化的重要分支,自然呈现出诗性精神的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吴越秀美的自然风光成为文人释放心情、抒发诗性情怀的一个重要的能指对象。

于是,文人们将审美的目光投注到大自然及日常生活中,相信自然界和人本来就是一体的,内心应该归依大自然的怀抱。如南宋的“永嘉四灵”,他们有口不谈世事,只是走向优美的自然山水,释放自己的性情。这种审美传统对后世文学创作的影响十分巨大。正因为这样,“永嘉四灵”以清新脱俗之词写野逸清瘦之趣,经元末的杨维桢、王冕到明中叶的徐渭等,形成了一个个性灵文学流派。后来的陶望龄、王思任、张岱也积极响应。

作为一种沉淀的文化传统,吴越文化的这种诗性特质也同样影响到汪曾祺。汪曾祺以充满灵性的审美智慧来进行文学创作,其特点是他总是善于在吴越之地的自然山水中寻找美,寻找缠绵的诗情,释放自己的心灵。吴越之地一年四季秀美的自然风光,成为汪曾祺张扬诗性审美的载体,成为汪曾祺确证自己心灵自由的对象和符号。黑格尔认为:“人必须在周围世界里自由自在,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他的个性必须能与自然和一切外在关系相安,才显得自由的。”<sup>②</sup>汪曾祺就是以客体的吴越自然山水来抒发自己的诗性情怀。自然在他这里,既是形而上的、超越的,又是形而下的、感性的。为了寻找安顿心灵的彼岸世界,崇尚自然成为汪曾祺的审美理想,写景状物成为他小说的特点。

因此,汪曾祺在他的小说创作中,有意地渲染自然给予人的审美感受,特别是心灵的审美感受。例如,在《受戒》中有一段写景文字,描写小英子的家像一个小岛:“岛上有六棵大桑树,夏天都结大桑葚,三棵结白的,三棵结紫的;一个菜园子,瓜豆蔬菜,四时不缺。”“屋檐下一边

<sup>①</sup> 刘士林:《江南诗性文化:内涵、方法与话语》,《江海学刊》2006年第1期。

<sup>②</sup> [德]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322页。

种着一棵石榴树，一边种着一棵栀子花，都齐屋檐高了。夏天开了花，一红一白，好看得很。栀子花香得冲鼻子。顺风的时候，在荸荠庵都闻得见。”这里，众多的水、桑树桑葚、瓜豆蔬菜等，都是典型的吴越风光。这种吴越风光清澈、明净、柔性，富于诗情。小英子家的周围繁花掩映，树木成荫，菜圃成片，堪称世外桃源。在现实生活中，人往往会遭遇各种矛盾的冲撞，严重的甚至会导致人的本性扭曲。返回自然，实际上是要求人们在摆脱现实矛盾的纠缠中，获取人的生命自觉的一种方式，从中过滤人性的丑陋，凸现健康人性。像小英子就是因为吸吮吴越天然清纯的空气而显得清新、自然、美丽、纯洁。又如，《大淖记事》中的自然景色描写：“淖中央有一条狭长的沙洲。沙洲上长满茅草和芦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红色的芦芽和灰绿色的萎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绿了。夏天，茅草、芦荻都吐出雪白的丝穗，在微风中不住地点头。秋天，全都枯黄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顶上去了。冬天，下雪，这里总比别处先白。化雪的时候，也比别处化得慢。河水解冻了，发绿了，沙洲上的残雪还亮晶晶地堆积着。”汪曾祺俨然不是用笔在描绘自然景色，而是用情感用心灵在抒写这生命之境。大自然的优美、纯净已经深深内化为他的精神底蕴。再如，《鸡鸭名家》中的写景文字：“白莲湖是一口不大的湖，离窑庄不远。出菱，出藕，藕肥白少渣。……湖边港汊甚多，密密地长着芦苇。新芦苇很高了，黑森森的。莲蓬已经采过了，荷叶的颜色也发黑了。人过时常有翠鸟冲出，翠绿的一闪，快如疾箭。”借助吴越地区这种充满诗情画意和柔性特征的景色，汪曾祺构建了桃花源式的诗意乡土世界，充分展现了他追求形而上的“自然”本性的诗性情怀。有学者认为：“江南文化对江南作家的影响，除了它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因素之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影响的因素，作为母文化的基因成分，已深深地融化在他们的精神血肉之中，孕育了他们一种极具地域性特征的文化性格和审美心理，成了他们认识世界、表现人生的一种最基本的，也是极具个性特征的思维方式、审美

方式和艺术表现方式,从而使他们的创作总是能够代表中国文化、文学、艺术的最感性、最唯美、也是最柔情的一个方面,同时也使江南的富庶、江南的风情,江南自然与人文景观的色诱和情殇以及那种独特的柔美飘逸、柔情细腻而又略带颓废放浪、且又是抒情浪漫的江南气质和审美映象,都对生活在华夏文化圈内的人形成了一种永恒的心理召唤和审美诱惑,使之萌发出一种置身于人间凡尘,又企盼超越世俗樊篱之束缚的生命感怀。”<sup>①</sup>汪曾祺刻意描写吴越自然风光,把自然作为自己生命中的重要部分深情摹写,从某种意义上说,所传导出来的就是追求精神乌托邦,企盼心灵自由的主体性情怀。在汪曾祺笔下,自然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与人生意义和终极理想紧密地对应和结合起来了。

汪曾祺用抒情笔法展示纯美、古朴的自然,这其实是他对完美人性的渴求。在小说自然诗化的表达中,汪曾祺将道德范式引入其中,以体悟和直觉的方式再造自然道德图式。在汪曾祺的笔下,吴越地区的自然是一种遮蔽现实的自然,在这儿只有青山碧水,红花绿树,人物也是率性淳朴,一清如水。这种否定当下的价值观,凸现了汪曾祺崇尚自由的诗性情怀。他以形而下的自然实体来象征形而上的自然(自由)心境。因此,吴越自然山水成为汪曾祺小说抒情的能指对象,实际上也成为他的生命情感的一种形式。这是汪曾祺超越世俗藩篱束缚的精神动力。

## 二、吴越风情风俗与汪曾祺小说的诗性感悟

在 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创作主体的不同价值取向,构成了同时并存的三大文化空间。学者陈思和在《试论知识分子转型期

<sup>①</sup> 黄健、王华琪:《现代江南作家的柔性艺术风格》,《名作欣赏》2006 年第 22 期。